

# 最近毛共「圍剿派性」問題的研析

王卜珊

## 一 前言

毛澤東一小撮人物搞「文化大革命」，現在已近二年了，這之間，從「文鬥」到「武鬥」，從思想理論之爭，到造反奪權之爭；從羣衆運動大吹大擂，到黨團組織重整重建，這些都是兩年來，高潮迭起的主要事態。但其最後目的，似在建立一個以「毛澤東爲中心」的獨裁政權，及以「毛澤東思想絕對權威」的黨團組織，完成他個人統治的夢想。因此，毛澤東對人類文化說，不惜以人性理性，自由民主的現代思潮爲敵，對共黨思想說，不惜與原來的馬列主義，現代的修正主義爲敵，寧願一手毀黨，一手建黨。企圖重寫歷史，「萬年長青」「永不變色」。這就是毛澤東及其一小撮人物的狂妄之處。

毛共搞「文革」運動，從「破」「立」兩字入手，先「破」而後「立」，文化思想如此，黨政組織也是如此。照一般的邏輯說，破壞易而建設難。毛共在「文革」初期，藉紅衛兵的破壞力量，軍隊的血腥鎮壓，真似一場大風暴，橫掃大陸，一切所謂黨內外的「牛鬼蛇神」反共反毛的個人或集團，都望風披靡，在批透鬥臭之下，或打入勞改營，或受幽禁，或被虐殺，不一而足。毛共雖然逞快于一時，然維持一個偽政權，所必需的組織體系，政治軌道，如何再從新建立起來，毛共却遭到難題了。

毛共所領導的「文革」鬥爭方向和紀律，是有幾個階段的：五十五年五月至八月似以鬥文教界人士爲重點，暴風雨的開始，大門文教界的「三名」人物。八月以後，爲期一年，以批鬥劉鄧派爲重點，大門黨政中的修正主義的人物。五十六年一月由于上海造反奪權到手，即以上海建立的新政權「三結合」的形式爲模型，大力倡導各地區各單位的奪權，也以「三結合」爲標準了。直到今日大陸二十九個直轄省市，經毛共宣布奪權到手的，僅有十四個單位，其他縣、局，姑置不論。今日毛共還爲這個「三結合」而努力。另一重大的與「三結合」息息相關的「大聯合問題」，從紅衛兵之亂開始，一直

最近毛共「圍剿派性」問題的研析

是有「內鬪」和「內戰」的，五十六年二月軍隊介入造反奪權以後，就演變成「武鬥」了。毛共取消極的一再呼籲「停止內戰，停止武鬥」以外，積極的是要求紅衛兵的羣衆組織，應該犧牲私權私利，實現所謂的「革命大聯合」，促進「三結合」。今日毛共也正爲這個「大聯合」而努力。

## 二 對毛共「文革」現勢不同的推

### 論

毛共的「文革」運動，演變至于今日，憑着毛共大量的公開的資料，世人已有若干不同的推論，來研析當前毛共所處的政治形勢。

論者之一：認爲毛共「文革」形勢好轉。毛共「造反」「奪權」的鬥爭，在中央黨政機構部級單位中，大體上已經穩定了。對中央黨政人物的批鬥，最大的修正主義者劉鄧已倒，成爲「活屍」，以次人物，其抗拒力量，尤爲微弱；中央黨政機構內部的鬥爭，反復較少，已告一段落。至于地方黨政幹部，毛共可使用其他方術，慢慢收拾。軍隊介入奪權以後，固已成爲唯一依靠的支柱，但軍隊本身的「宗派主義」或反毛反共，演成的內鬥武鬥，以五十六年八月「武漢事件」結束爲分水嶺，毛共大體上也可以控制軍中的情勢了。像最棘手的新疆、西藏問題，也先後解決了。這些都是對毛共有利的一方面。

論者之二：認爲毛共「文革」是對黨內一次大整肅的運動，是全面性羣衆性的。毛共既不可能搞得徹底，也不可能獲得全勝。毛澤東自己的祖師爺，如馬恩列史，當他們自己搞政治工作時，也常常鬧分裂，鬧政變。特別是列寧和史達林。史達林一生屠殺過多少黨內的「老同志」「老戰友」，但他所建立的紅色獨裁政權，也僅僅是與他共呼吸而已。而死後仍遭他的親信黑魯曉夫之流大鞭屍、大批判，辛苦三十年所建立的「個人偶像」終於在紅色廣場

中倒地了。毛匪走史氏的歷史舊路，而政治整肅，採取與史氏較陰柔的手段，至少還不敢彰明較著的用刀殺人。因此，毛共黨內一般反毛幹部，只有在這「文革」的風暴之下，暫時隱藏起來，偽裝起來，祇要一旦風吹草動，他們又會活躍的。正如毛共論定劉鄧的「九字真言」說：「人還在，心未死，口不服」。

論者之三：認為毛共「文革」無論在思想上，組織上要做到「破」「立」兼顧，絕不是一件咄咄可辦的事。毛共要先「破」而後「立」，搞「大聯合」「三結合」是「立」的第一步，萬里長征的第一步。如果有了「大聯合」，一個新的「毛澤東黨」的羣衆也就有了基礎；有了「三結合」，一個新的政權組織形式，也就初步確定了。毛共懂得這些！但并不是說「大聯合」「三結合」就解決了黨政問題，只是在大動亂中一個過渡的辦法，毛共掌握住鬥爭方向和規律，也必需有這個過渡的辦法。剩下的問題，毛共可以在微風細雨下慢慢求得解決。這種論定，是爲毛共打如意算盤的。

論者之四：認為「文革」由于鬥爭面太廣，遭受各方面的阻力太大；軍隊的介入，軍隊本身的政治態度，決定支左與支派的傾向，引發了「武鬥」，波濤起伏，一時難于平息。即「武漢事件」過後，十一月各地區的「武鬥」日益激烈！特別是在各個已經成立革委會奪權得手地區，紅衛兵與軍隊之間，幹部與軍隊之間，仍多糾葛。似乎毛林派于打倒劉鄧以後，內部的權力鬥爭，接踵而來此種事態，至爲顯著。且軍隊已成爲奪權之主力，已破壞了匪黨、政、軍間的權力均衡，更破壞了匪「以黨領軍」的傳統原則，毛匪打倒了劉鄧的修正主義，却培養了軍隊的「山頭主義」，恐怕毛匪的「獨裁寶座」，還沒有坐穩以前，各地區的軍事頭目，却已建成了「獨立王國」了。而每個山頭之間，必有更多的矛盾，也將醞釀更多的「武鬥」了。

這些論客，似均有所見所惑，但都難免以偏概全。倘以毛匪去年九月以後，所發出的「新指示」「新戰略部署」以及周匪十月在武漢講話內容，加以比較論證，尤爲明確。

據說，毛匪于武漢事件初定以後，曾巡視華中、華南、華東若干多事之區，而後發出這個指示：

「要鬥私批修，要擁軍愛民，要抓革命，促生產，促工作，促戰備，把各方面工作做得更好，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！」

十月周匪恩來，隨阿爾巴尼亞代表團訪問武漢，曾在一次羣衆大會講話，說明毛共當前的工作重點與政治形勢：

「現在擺在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革命羣衆面前最重要的任務，就是緊跟毛澤東的偉大的戰略部署，牢牢掌握革命鬥爭的方向，搞好革命的大批判，實現革命的大聯合與三結合，把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，鬥倒批臭，搞好本單位的鬥、批、改」。

周匪這一番說詞，是毛匪「戰略部署」的註釋，也是比較具體的內容。至于林匪彪十月偽慶的講話，倡議大辦「毛澤東思想學習班」，是以「鬥私批修」爲綱，企圖爲「大聯合」「三結合」在思想上鋪路的；本年元旦，匪爲文告，規定了「五大戰鬥任務」，也是跟隨毛匪所劃的路線走的。並沒有什麼新意義。當然內有「整黨」「建黨」的一項，是新的課題，這是毛匪于毀黨之後，企圖建立一個「清一色的毛澤東黨」一種必然的邏輯。

目前毛共政治形勢的輪廓，大致如此。

### 三 毛共為「毀黨」「建黨」「毀政」「建政」而努力

毛共搞「大聯合」與「三結合」是當前或未來一段時間「建黨」「建政」中一個重要步驟。「建黨」必須要有羣衆基礎，而紅衛兵的組織，以年青的一代青年學生爲主力，最爲理想。但紅衛兵在這場大門爭中，所表現的，又不是盡如理想。因此先有「一邊聯合，一邊整風」才行。況且毛共「建黨」已有一個藍圖，在元旦文告中透露出來：①要吸收一批「文革」中的「先進份子」入黨，清除叛徒，特務和一切頑固不化的當權派。②犯過嚴重錯誤的黨員，要認真進行自我批評。③在整黨的同時，從思想上，組織上整頓青年團與紅衛兵，其目標是淨化組織，消除派性。④在黨、政、文、教部門，要建立一個無產階級的隊伍。這就是毛共當前「建黨」的「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務」。一說在今年九月，毛共將召開一次「九全」大會，來結束毛匪二年來「毀黨」的工作，開始塑造一個「新毛黨」。但在「九全」以前，對紅衛兵組織的整風——即「圍剿派性」搞「學習班」，製造有利的政治形

勢和氣氛，即工、農、兵各種不同類型的代表會，在各地區召開，打聽打聽，頗為熱鬧。

另一是「建政」的問題。毛共的造反派紅衛兵，是一支破壞隊伍，進行造反奪權的鬥爭，使得原有的政治結構，政治功能，在尖銳反復的鬥爭中，被打亂了，打垮了。且紅衛兵本身，一度為「無政府主義思想所統治」，也是一種青年苦悶的發洩，見事就反，見人就鬥，造成「紅色暴亂」。現在毛匪把劉鄧鬥倒以後，當然需要收拾殘局了。也需要自己真正能够重掌「政權」，因此搞出一個「三結合」臨時的過渡的政權形式出來。

「三結合」是三支政治力量的組成。以紅衛兵代表作為社會的羣衆力量。以革命幹部代表，也可說是擁毛派，作為原有黨政的力量；以軍隊代表當然是軍事的支持力量，同時又是專政的工具，鎮壓反動的力量。這三種代表人物結合起來，在某一地區，某一單位，成立了革命委員會，就算是奪權得手，立即策劃和執行一切政治工作。由於地區遼闊，單位繁多，自中央以至地方，情況至為複雜，毛共為了適應各種情況，規定政治條件較好者，可直接成立「革委會」，稍差者，可先組成「革委會籌備小組」，更差者則僅組成少數派的「領導小組」。自中央政府以下各省、市、地、局，以及各機關、各學校、各工廠、各礦場、各公社、各企業貿易單位，一律如此。因此，奪權是全面的，組成革委會也應是全面的。但自新年以後，毛共的宣傳口吻略有變化，那是只強調如何組成革委會，却抹除「奪權」的字樣，似乎在緩和黨政幹部的反感，但這是一件掩耳盜鈴的事。

「三結合」的代表，如何產生呢？名次名額，又是一個新的權力鬥爭！以紅衛兵的代表說，它的「組織山頭很多」，必須在「大聯合」的前提下，才能產生，方為合理。但如何「聯」法？如何「合」法？誰領導誰？誰站在前面，誰掌握多數，誰的功勞最大，誰的作風最左？誰是毛江的嫡派？誰是……這些問題，都圍繞在好些「紅衛兵組織的頭頭」腦海裏，盤算不清的。毛匪謂之為「私字作祟」「派性作怪」。倘紅衛兵的「大聯合」不成，「三結合」代表就無法產生？如勉強產生了，立刻就會引起新的鬥爭。

其次是所謂「革命幹部」的代表問題，絕大多數的老幹部，都遭受過造反派的大批大門，但新幹部却因工作經驗不足，不能做「接班人」。因此，現在毛共改了口風，說「老幹部是黨內的財富、寶貝」。除了「帶着花崗石的

頭腦去見上帝的人」以外，祇要幹部認錯，仍可以參加「三結合」，過關了事。然而「新」「老」之間的許多矛盾、猜忌，雙方一時是無法了了的。所以即使幹部，在「三結合」中出隊亮相了，明爭暗鬥，仍有繼續。毛匪也名之為「私字當頭」「派性作怪」！

再次，是「三結合」中的軍隊代表，這是毛匪一直在「文革」的大賭檯上所握有的「王牌」。「三結合」臨時權力機構中，軍隊代表所扮演的角色，是台柱，是主角。看今日十四個省市奪權得手所組成的「革委會」的「主任委員」三分之二以上是軍隊代表擔任的，不是「司令員」就是「政委」。然而各地的「武鬥」，並沒有就此停息，一方面是紅衛兵「鬥爭的矛頭，還有指向解放軍」的，另一面解放軍支持、鎮壓，却「站錯了隊」「看錯了人」，因而毛共一再喊出「要擁軍愛民」，企圖改善軍羣關係；「要支左不支派」，藉以糾正軍隊的錯誤，嚴重的擴大了「派性」助長了「派性」。

毛共當前的任務，是在「毀黨」「毀政」以後，如何收拾殘局。搞「大聯合」「三結合」「革委會」是第一步。然而羣衆組織中的「派性」却是一個重大的絆腳石，因而批鬥「派性」，也就成為當前的高潮。

## 四 毛共要求「打一場圍剿派性的人

### 民戰爭」

毛共所謂的「派性」問題，雖然它自己沒有下過什麼定義，但是根據資料可以解釋的，「派性」是個人主義的擴大，宗派主義的縮影或雛型。毛匪要搞「毛澤東黨」「毛澤東教」，自然無法容忍「派性」和他唱對台戲。然而「派性」存在于羣衆組織裏，存在于幹部中間，存在于軍隊裏，真是「汪洋大海」一般，所以浙江日報和江西電台幾乎同時喊出需要「打一場圍剿派性的人民戰爭」了。

據說：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派性，是鞏固和發展革命大聯合，促進革命三結合的最大障礙最大敵人」。把「派性」說得最具體的，莫過於上海的文匯報，浙江日報，河南日報和湖北，江西的廣播評論，直率坦白地指

出「派性」的面貌及其毒害出來。

上海是最初成立「三結合」式的「革委會」奪權掌權到手的地區，但一年以來，上海新政權一直是不穩定不鞏固的。「派性」的鬥爭，一天也沒有停息過，因而「文匯報」指陳「派性」的內涵，也比較真實。「文匯報」說：

「資產階級、小資產階級的派性，是一條大毒蛇，被它纏上了身，就不得了。有的同志，已纏上了這條毒蛇，中毒很深。為此必須歷駁派性的十大罪狀，以引起一切革命同志的警覺：

(一) 對待最高指示，對待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聲音，不是句句照辦，條條落實，而是各取所需，干擾鬥爭的大方向，動搖毛主席司令部的戰略部署。

(二) 爲了一派的私利，什麼人民的利益，什麼黨的利益，什麼國家的利益，什麼全局的利益，統統拋在一邊。

(三) 混淆敵我界限，包庇階級敵人。同意「我」的觀點，不管是特務，叛徒，都是「同志」；不同意「我」的觀點，即使是同志，統統成了「敵人」。

(四) 在清理階級隊伍時，眼睛只看着對方組織，一旦從中揪出了幾個壞人，就以偏概全，幸災樂禍，乘機否定兄弟革命組織的大方向，爲此不惜武鬥，大開內戰。

(五) 凡是爭席位，爭核心之日，正是派性惡性發作之時，「以我爲核心」，就是他們的錯誤口號。革命大聯合可以不要，但是席位非爭不可。

(六) 解放幹部一律以是否利于「我」這一派爲標準，順「我」者昌，逆「我」者亡，因此忽而大聲疾呼「全部解放」，忽而翻臉宣佈「一律靠邊」，左右搖擺，變化無常。

(七) 大吹大擂，自我標榜，貪天之功，佔爲己有。

(八) 用派性反派性，借反對別人的派性爲名，行擴展自己的派性是實。當他們在高呼「打倒派性」的同時，還要帶上派性的尾巴「××(本組織的大名)必勝」。

(九) 派性嚴重的人，朝秦暮楚，縱橫捭闔，當面一套，背後一套，台上手，台下踢腳，耍資產階級政客的作風。

(十) 派性嚴重的人，什麼都是爲派性服務，推行反動的實用主義，他們

甚至斷章取義地用毛主席語錄去攻擊對方，學風惡劣，達到不可容忍的地步。(註一)

最後「文匯報」爲「派性」加上一頂「反動」的帽子。論斷地說：「資產階級、小資產階級的派性，是一種反動性，逆革命潮流而動，叫做反動」。

浙江日報，痛論「打倒派性」，說：

「在全國全省一片大好形勢下(？)派性紛紛登台表演，熙熙攘攘，吵吵鬧鬧，披着五顏六色的外衣，向我們散發臭氣。請看：

「大聯合要以我爲核心，我的席位要多，名次要在前面。

「三結合要以我爲準，要我通過，否則……

「大批判要掛我的旗幟，鬥批改，不合我的私利就改，合我的私利就留

「大學習，合我的口味的就實行，不合我的口味的就不作。」

「對我有好處的，就是革命路線，對我沒有好處的，就是反動路線。

「對自己，唯我獨尊，唯我獨左，老子天下第一，老虎屁股摸不得；對別人，凡是同意我的觀點的都是同志，否則就是敵人。」

以上六種派性，是浙江日報指出來的。最後它復提出警告說：「有些地方，即使有條件實現革命大聯合、三結合，由于派性作怪，遲遲聯合不起來、結合不起來」。而且「實現了大聯合、三結合地方，派性又會像夜老鼠一

樣，專門打地洞，挖牆腳，破壞大聯合、三結合」。「有了派性，就會打內戰，搞武鬥」，因此，「必須把派性，看作革命的大敵有打倒它的必要」。

(註二)

浙江，是極動亂的地區之一，今日毛共控制下的浙江日報，已有「五論打倒派性」的社論，可見浙江派性的嚴重了。

河南日報，論打倒派性的社論，列舉九種事實，節其要點如下：

(一)「有些頭頭，對毛主席指示，採取實用主義，抽掉革命原則，爲小集團私利服務。

(二)「有些頭頭，明明犯了錯誤，却不願作自我批評。

(三)「有些頭頭，爲了多撈席位，提出無理要求，不按我的條件辦，我就不參加，就要碰爛，要造反。」

(四)「爲了擴大小集團勢力，到處招兵買馬，重立山頭。甚至把已經鬥垮了的保皇組織，重新拉回去，美其名曰：『歸隊鬧革命』」。

(五)「有些頭頭，對發展革命大聯合，採取拖的策略。拖到自己人多勢衆時，以便增加聯合資本。」

(六)「有些頭頭，爲了小集團無理要求，不惜實行經濟主義，煽動停工停產，停交通，向無產階級司令部施加壓力。」

(七)「有些頭頭，千方百計地庇護支持他們派性活動的某些別有用心的人和叛徒，并美其名曰：『保護革命領導幹部』」。

(八)「有些頭頭，還熱衷于打內戰，醉心于鬧無原則的糾紛，另樹派系，製造分裂。」

(九)「有些頭頭，鬧山頭主義，小團體主義，不認真執行政策，聽不得不同意見：影響大聯合」。(註三)

河南日報結語說：「派性是毒蛇，必須要以無產階級的黨性，去克服和戰勝它」。

至于江西、湖北省級的廣播，對派性都加以「圍剿」，而且指出幹部之間的派性，十分嚴重。廣東、安徽、內蒙、北平等地區，爲了打擊派性，把文匯報社論，當做一個重要的學習文件，當着一面鏡子，照照自己。江西則在一月廿六日，在南昌體育館「舉行了打倒派性，斬斷黑手，無產階級革命聯合起來大會」。實際上是一個羣衆性的打倒派性示範式的鬥爭會。據說：「在大會上，革命羣衆把一貫利用派性，挑起武鬥，專門幹罪惡勾當的大叛徒，大黑手，前商業廳副廳長王某揪了出來。又把以極左面目出現，打着造反旗號，專門在無產階級革命派隊伍製造分裂的壞頭頭馬某揪了出來」。指出江西商業單位，交通系統所以長期打內戰，聯合不起來，就是因爲有王某馬某在幕後操縱，挑起事端，煽動武鬥。(註四)

以上是羣衆組織與幹部間的派性問題，經毛共自動揭發出來，十分具體。至于軍中派性，也難于醫治的。一月廿八日解放軍日報發表一篇「認真執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則」，就是對軍中的派性而發的。它說：

「凡是革命的羣衆組織，都要支持，不能親一派，疏一派，支一派，壓一派；也不能你是左派，我就什麼都支持。」

「今天混在內部的一小撮叛徒，特務，黨內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和

社會上的階級敵人，不甘心他們的滅亡，正在千方百計地煽動和利用反動的資產階級，小資產階級的派性，進行挑撥離間，妄圖分裂無產階級革命隊伍。……這是在新形勢下兩個階級，兩條道路，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。

「我們一定要認清當前階級鬥爭形勢的特點，提高革命警惕，立場堅定，旗幟鮮明地，堅決執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則，同資產階級、小資產階級的派性，進行不調和的鬥爭」。

事實上，匪軍中的派系，一直是存在的，早期門高、饒、彭、黃，說是他們搞宗派主義，今日門羅瑞卿，門賀龍陳毅等，毛派紅衛兵也有同樣的指陳。因知軍中的政治人事關係，嚴格的說，并非毛林一家的天下。去年二月初，林彪對軍中高級將領講話中，也承認了軍中內部已發生過「好人鬥好人，壞人鬥壞人，壞人鬥好人，好人鬥壞人」等各種尖銳複雜的鬥爭情況。至于「支左」問題，也往往摸錯門，站錯隊。引發更多的武鬥。直至今日，仍難于息滅。比較綜合的觀察，軍中約有四種「支派不支左」的偏差：

(一)是支持一派，壓另一派，幫助一派，吃掉另一派。

(二)是支左工作，冷一陣，熱一陣，對自己所願支持組織視如兄弟，不願支持組織，找上門來，也不理會。

(三)是外地調來的支左部隊，往往未及調查研究，在鬥爭中站錯隊，支左變成支右，沾上血腥，一時又難于脫手。

(四)一度採取中立態度的部隊，「坐山觀虎鬥，自以爲得意」，後來受到「左」「右」兩派的夾擊，陷于派性的鬥爭。

因爲有這四種的偏差，武漢事件以後一度沉寂的武鬥，又復到處湧起。這是軍隊「支派不支左」的後果。且軍隊本身的宗派關係，正打着「支左」的旗號，幹着反毛的工作。毛匪今日提出「支左不支派」的原則，只是一種替代的說法而已。

## 五 結論

共產主義的哲學理論基礎，原在先天上有它的分裂性。因爲它從唯物辯證法而來。唯物辯證法，最重要的法則之一是矛盾對立和統一的法則。列寧



強調內在矛盾對立的一面，毛匪却更進一步說，宇宙的事物，是「永遠一分爲二」的。若此，共產黨人內部鬧「派性」問題，便非變態，而是常態了。此其一。

共黨內部的鬥爭，尖銳複雜，按諸史實，既有俄共的「先進榜樣」在前，毛共自也一步一趨！如列寧派與考茨基派的鬥爭，史達林與托洛茨基派的鬥爭；黑魯曉夫對史魔的鞭屍及其派系遺孽馬林可夫，布加寧等的鬥爭，這都是內部分裂，派系鬥爭的事實。而毛匪半生的政治生涯，幾乎無日不在其黨內搞權力宗派的鬥爭，這也是事實。此其二。

在此次「文革」中，製造派性，實在就是毛澤東自己。當紅衛兵初起時，毛匪不是大力讚揚紅衛兵「革命小將」是「造反派，革命派」嗎？把劉鄧若干以次人物，批鬥對象，說是當權派，走資派。因此，有了兩派的對立，就便于組織鬥爭了。同時把黨內的老黨員、老幹部，公社中的老農人，工廠中的老工人，又加以階級的分析，歷史的清算，又分出什麼「左派」「右派」來。紅衛兵的組織裏面，又分出什麼「真革命派」和「假革命派」出來。這些無數的宗派名稱，主義區別，都是毛江這一小集團製造出來的。若要「圍剿派性」，首先就要清算毛匪製造派性的思想和罪行了。這在匪黨幹部和青年羣衆，稍有理性的人，應該看得十分清楚的。此其三。

毛匪運用辯證的說法，毀黨毀政，整幹整人。然而辯證法這一思想方法

## 影響國際關係的重要因素

鄭傳明

### 前言

國際關係是指國與國之間的相互關係。在以前，對於這方面的研究，主要是側重於國際法和外交史的範圍。但在近五十年以來，由於交通工具的發達，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增加了，國與國之間的交往也日益頻繁，故除了國家之間的法律關係和過去史實方面而外，更着重於各種動態的研究，譬如國際經濟、文化交流、民間接觸等，在在都直接間接地影響到國與國之間的關係。

應該是中立的，毛匪知道如何運用它，其他的匪幹和羣衆，又何嘗不知道運用它，來對付毛匪陰謀詭計的變化。看匪報的自供，指出派性具體的形象面貌，許多幹部和羣衆，就是運用辯證的方法，忽左忽右，忽明忽暗，來應付毛匪的。正如列寧所說的：「由工人運動內部的機會主義派別活動家來維護資產階級，比資產者親自出馬還好」。劉鄧派是打倒了，但劉鄧派的幽靈，却到處出現，不過它是換了另一個更曲折更狡猾的姿態而已。但是這種方技，是「毛澤東思想教導出來」的。此其四。

當前毛匪的政治形勢，是要加速地完成「大聯合」與「三結合」的，加速地建立新的「毛澤東黨」和新的基層的臨時政權機構，維持表面上形式上的統治。但派性却和毛記的黨性鬧對立，這是毛匪自感頭痛的事。因而大力「圍剿派性」，企圖在短時期內用各種方法，如軍隊的再次鎮壓，學習班中的自我批評，宣傳工具的大批判，都是必要措施。但派性是否就此消滅，根據上述論定，絕無可能。派性也者，當與毛黨共存亡。

五十七年二月十七日脫稿

註一：見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匪新華社廣播。

註二：見一九六八年二月六日香港星島日報四版轉載。

註三：（同上）。

註四：見一九六八年一月廿九日江西人民廣播。

每一個國家通常都是以本國的安全、人民的幸福與福利做爲追求的目標，但各國在實現這項目標的過程中，難免經常涉及本國領域以外的其他國家，有時彼此合作，有時發生衝突；有時採取和平的合法手段來達到目的，有時就發動戰爭非法強求。因此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往往發生一種力的關係、力的競賽和力的鬥爭。

### 二 影響國際關係的重要因素